

壮族地区人地关系 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

ZHUANGZU DIQU RENDI GUANXI GUOCHENG ZHONG DE HUANJING SHIYING YANJIU

刘祥学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壮族地区人地关系 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

ZHUANGZU DIQU RENDI GUANXI GUOCHENG ZHONG DE HUANJING SHIYING YANJIU

刘祥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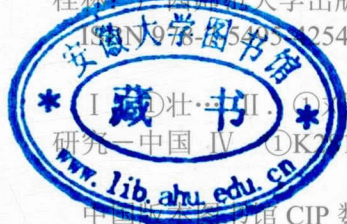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 / 刘祥学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95-4254-3
I ①壮 II. ①… III. ①壮族—民族地理—
研究—中国 IV. ①K2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5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8 字数: 49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一

2012年10月4日《文汇报》载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上海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称水稻驯化可能起源于8000年前的广西珠江流域,果真是如此,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民族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大矣。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耕作文化就是最原始的文化概念。虽然我们不能确定8000年前广西的原住民是什么民族,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处于珠江中游地区的广西及其毗邻的云南、广东部分地区,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是稻米生产地了。长期生息于这一地区的壮族及其先民,自古以来与水田密不可分,壮语中的“那”即是水田之意,而在广西,包含“那”字的地名成百上千,正是水田,亦即稻作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游汝杰兄证明稻作起源于广西,再向外传播,而遍布于中国南方地区,以至海外。因此研究壮族人民如何适应环境以生息其间,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地理的应有之义。

人地关系简而言之,一是适应,二是改造,荀子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也。本书题为适应,其实就包含着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利用过程,即一般指人类面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不断调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行为。但广义的适应行为其实还包含在适应过程中的

某些改造,并非全是被动地适应。但所谓环境适应除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方面,即人地关系之外,还有人人关系,也就是说,在自然环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人文环境,同样的,对于人文环境也存在适应的过程。例如说,与其他民族同处于一个自然环境之中,如何与这些民族相处,也是一种适应方式。因此这个环境适应其实是意义宽泛的适应,并不只是语词表面上的意义。

就目前的国内学术界而言,对于民族学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民族地理学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理论方面,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即使是称作民族地理研究的,也主要是研究民族的地理分布而已。真正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视角来揭示某个民族与环境的关系的著作,似未之见。刘祥学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这部著作,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起了一个垂范的作用。当然这个范是否垂得出色,是要学界与读者来评判的。

广西地区处于中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两可地带,既不像东部诸省那样发达,又比中部各省有其先进之处。但从历史上看,直到清代初期,这一地区显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果我们将眼光退回到唐代,很容易发现在广东东部与广西全境,州一级政区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一般而言,政区密度较高,意味着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但广西不同,数量众多的州级政区所表示的却是少数民族自治性质政权大量存在的史实。汉人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深入广西的平原地带,中央政权的统治也才逐渐深入,而此后平原地带稻米的种植依然延续,而由平原内迁丘陵山地的壮族先人则将稻米种植更进一步深入到丘陵地带中去。于是壮族及其先民对环境适应在自然与人文方面都有了深刻的变化。本书用八章的篇幅论述壮族在唐宋以前,尤其是唐宋以后的环境适应过程,使读者觉得分量厚

重,分析有力,将民族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鲜活地呈现了出来。

刘祥学在做博士论文之前,就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过程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事先已经对红水河流域的开发过程有了先行的研究,成为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一。对于珠江流域的研究,过去历来重下游与上游,而中游的研究相对薄弱。好在宋代有《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这样的著述,多少让我们领略了广西及其毗邻地区的大略面貌。到现代又有《岭表纪蛮》与《粤江流域人民史》这样的著作,使我们对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我与游汝杰合作《方言与中国文化》时,后者就是我们的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但比起其他地区来,有关广西以及壮族的文献资料又是相对比较缺乏的。因此除了从载籍中尽量爬梳有关的资料外,还必须深入民族地区做实地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壮民族的生活环境,使研究做到真正的深入可靠。在这方面刘祥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所以他能够将本书写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光做到这一点便不很容易,而且还使之成为民族地理与普遍性的人地关系相结合的作品,那就更难了。当然,在学界,这样的研究与写作还只是一个尝试,但良好的开端必定会促进更好的延续进展,我们希望有同类的研究能够出现,更希望这部书之后还有更高质量的后续著作行世。

周振鹤

2013年4月6日

序 二

2004 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历史地理学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代表刘祥学君。当时他提交的论文叫《明代驯象卫考论》,是很少为人关注的题目,分析问题比较精细,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历届历史地理年会都没有广西的代表参加,而他是第一个,并且比较年轻。当时我就感到,这个小伙子可能就是广西地区未来的历史地理学领军人物。

果然,四年后便参与评审他在复旦大学所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论文洋洋数十万字,从宏观理论到个案研究,从地理环境到民族形象,紧紧抓住环境适应这一主线,阐明了他对壮族民族过程的独到看法。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图文并茂,思维缜密,充分体现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由此,他成为广西地区获得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为他向更高层次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祥学君又对博士论文继续充实修改,现在准备付诸剞劂,嘱我作序,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为表庆贺并资鼓励,故乐为此短序以志之。

近年来,关于是否可以建立一门新兴的独立于历史地理学之外的民族历史地理学的讨论较为热烈。主张建立者,认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其规律的科学,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内容,而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历史民族地理,则只研究与民族相关的人文地理现象,不研究与民族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历史民族地理不仅要研究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也要研究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族历史地理与历史民族地理名异而实同,都属于历史地理学,不必另建独立学科。

祥学君研究的是壮族的历史地理问题,但他没有纠缠于是从“壮族历史地理”还是从“历史壮族地理”角度出发,他认为:“加强民族地理,尤其是西部边疆省区的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形势的需要。”因此本书不仅涉及相关的人文地理因素(如农牧业、语言风俗、民族关系),也涉及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如地形气候、水林资源),用典型实例回答了这个问题,表明了他的观点。

远古的岭南地区是百越民族的乐园,青青平溪之畔,莽莽群山之中,生活着许多原始渔猎部民,他们如何经营农牧业,参与环境与文明的演进过程,以至于形成现代的壮族,这是包括历史民族地理在内的学术界从未涉足的问题。一般来说,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多是从空间进程的角度复原民族人群的地域分布及其演变,而祥学君则独辟蹊径,从人地关系角度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将壮族形成过程与环境适应过程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民族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落俗套,独具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选取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作为研

究对象,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对壮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及其环境适应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深入的研究,这在历史民族地理领域尚属首次;现实意义在于,研究成果对广西壮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应当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颇富创见地提出“汉化”是壮族与其他民族相处主要的适应方式,是一种“生态适应策略”,同时还关注到壮族地区汉民的“壮化”问题。作者考证了壮族称谓“撞”词的最早记载及其向“僮(獐)”的演变,揭示了壮族的民族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壮族空间分布版图的演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细致的考察,精辟总结了演变规律,阐明了壮族地区人地关系变迁的三大特征:从区域差异看,平原丘陵与山地的区别,是壮族地区人地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从时间序列看,清康熙之际是壮族地区人地关系变迁的转折时期;壮族地区环境变迁的速率与距离汉族控制的统治中心的距离成反比,与交通发展状况成正比。作者还重点考察了历史上壮族对特色自然资源的利用,其中,对桫欏、竹、木棉等特色林木资源的利用有精彩的分析。

祥学君的家乡平乐县在 1000 年前的宋代叫昭州,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有一则故事说,昭州管下的昭平县唐代曾做过富州州治,位处漓江之滨,然而荆棘丛中,只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时人谓之“三家市”。曾有舟客登岸,饮醉,遂宿茅屋家。夜半,听闻门外“托托”有声,主人戒客曰:“毋开门,此虎也。”及明,客奴起而视之,果见一母虎带数子离去。去非不禁感慨道:“今为县乃尔,不知昔日何以为州耶?”其荒凉落后可想而知。时至今日,广西首位历史地理学博士竟出自此方此土,古今人文环境变迁,真是难以想象!由此可见,八桂大地尽管开发较之中原为晚,但随着各族人民的共

同努力,其经济文化发展势头,则不可限量。

本书涉及范围较广,时段较长,又属开辟之作,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壮族地区”,本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区域概念,即居民虽以壮族为主,亦应包含其他杂居民族在内;如是“壮族”,则是文化人群概念,这类文化人群又称族群(ethnic groups),他们在历史时期的活动空间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何界定这种动态的空间范围,尚需作出理论解释。祥学君对本书所用“壮族地区”的定义是:“基本上是以今广西为主,包括云南的东南部和广东的西部地区。”(见第一章)但按第一、二、六、七章论述壮族形成过程来看,则是动态的空间范围;在第三、四、五章论述壮族的环境适应时,却又基本上只使用了今广西地区的史料,极少有云南和广东的。即研究对象的地理空间概念稍欠明晰。何况这些史料很多是州县地方志,这些州县往往有其他民族杂居,而原文并未说明是什么民族的行为,如果都将其作为壮族资料来使用,恐怕有失准确。此外,壮族先民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对土壤、矿产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对特色果木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等,都还可以做一些研究。

祥学君师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周先生十分关注历史政区的建置与自然区、经济区、文化区的重合程度,认为四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广西自唐代分为岭南西道,历宋之广南西路,元之广西两江道,明清之广西布政司,至今境域大致未改,是否与壮族的环境适应与各族间的融合同步进行,以至于封建政治体制得以缓步向基层延伸而不必引起社会动荡有关,也是值得今后深入研究的问题。

学问不是一个人一本书能够做绝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每走一步回头看看,瑕疵处处皆是,还得靠自己或别人重新拾掇,正所谓“学不可以已”,否则学问就不成其为“学问”了。祥学君这本书

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已经令我非常佩服了,有一小问题,也是正常的。相信祥学君一定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西历史地理、壮族历史地理研究做出更大的成就。愿与君共勉!

郭声波
2013年4月6日于暨南大学暨南花园

目 录

导 言	1
一、选题缘由	1
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5
三、几点说明	15
四、材料、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16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壮族的形成发展	19
一、地理环境与民族的形成发展	19
二、壮族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	23
三、壮族文明进程中的人地关系	28
四、壮族文明与社会人文环境	36
五、本章小结:民族特性中的环境因素	38
 第二章 壮族空间分布的变迁	41
一、壮族民族过程中相关史料问题辨析	41

二、壮族空间分布的变迁	55
三、本章小结:壮族空间分布变迁的地理因素分析	118
第三章 水、林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125
一、水与农业环境	125
二、水与聚落环境	142
三、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53
四、对水、林资源的保护	170
五、本章小结:壮族对水、林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自然与人文制约因素	181
第四章 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	184
一、耕作技术的适应	184
二、水稻种植对环境的适应	204
三、农作物种植结构	220
四、饮食结构的适应	250
五、本章小结:耕作技术、种植结构变迁与环境关系的特点	258
第五章 畜牧与狩猎	262
一、农耕区中的畜牧业	262
二、农闲之余的另一种生产——狩猎	296
三、本章小结:影响壮族畜牧与狩猎的人地因素	308

第六章 人文环境的适应：以壮族民族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312
一、从区域形象到民族形象	313
二、壮族民族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环境适应”	362
三、壮族民族形象的嬗变	418
四、本章小结：“壮族民族形象”嬗变的基本规律、人地关系因素及生态适应特征	421
第七章 民族关系与人地关系的适应	433
一、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	434
二、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民族关系	442
三、本章小结：人地关系对壮族民族关系影响的类型与途径	507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512
一、壮族地区人地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	512
二、影响壮族适应环境的相关因素	516
三、讨论：壮族环境适应的机制与机理	520
四、几点启示	525
引用文献	528
后 记	560

导 言

一、选题缘由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与之相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根据生态学的有关理论,所有生物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里演化,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生物体在形态与遗传基因等方面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宏观的生态系统内,一个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 group)其实可看作是其中的一个生物体。它的发展与文明进程的演化,处处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它的行为又会对环境变迁产生作用。在环境演化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对环境的感知与适应能力,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存状况,更关系着他未来的发展前景,同时还深刻影响到他自身的地域分布格局,以及经济活动、习俗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空间演化。因此,20 世纪以来,国外地理学界很早就

有人注意研究民族与环境的关系^①,一些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地理环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过程赖以展开的‘舞台’”^②。此外地理科学本身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行为地理学派、生态地理学派。尽管它们研究的对象是区域环境内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从广义上讲,它们的理论与方法,也为民族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相比于地理学其他学科,民族地理的研究明显属于薄弱环节,吴传钧院士甚至称中国民族地理学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③

众所周知,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问题始终是影响边疆稳定、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著名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埃莱娜·C. 唐科斯对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曾经轰动一时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在书中,他断言苏联“无法走出民族困扰的死胡同”^④。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她预见的正确性。直到今天,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还为车臣独立等民族问题所困扰。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伴生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成为西方强国集团借机加以干涉,以实现自己政治、军事目标的借口。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有 55 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地区。我国由于存在地

① 以作者所见,这方面的著作有[美]恩格伦:《民族发展底地理因素》,林光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日]藤冈谦二郎:《人类集团の地理》,东京,大明堂株式会社,昭和五十五年(1980)等。不过,国外学者所谈的实际上是指“种族”,而非我们今天讨论的“民族”。

② [苏]IO. B. 布朗利:《民族及其环境》,苗欣荣译,载《民族译丛》1991 年第 6 期。

③ 李志华主编:《中国民族地理·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④ [法]埃莱娜·C. 唐科斯:《苏联政府无法走出民族困扰的死胡同》,龚羽翼译,载《民族译丛》1980 年第 2 期。

域环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民族问题十分敏感、复杂的特征,决定了民族问题在我国也必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处理得妥当与否,必将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而要研究、解决民族问题,不仅要了解一个民族的过去,也要了解民族与地理环境相互之间关系的演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所面临的困难和迫切的发展需求。因此,加强民族地理,尤其是西部边疆省区的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既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现实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从民族地理研究的角度观察,以广西为主要聚居地的壮族无疑较具个案研究价值。因为从地缘上看,壮族地区地处南疆,地跨滇、桂、粤等省区,居国防前线,是我国边疆省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民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区域。从民族性格看,壮族是个性格温和、胸襟开阔、宽容的民族。考察壮族文明演进的历史就会发现,壮族人口虽多,却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政权;从文化上看,壮族是我国汉化程度较高,同时又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民族,其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习俗等各方面都有较多的汉化痕迹。从民族关系看,虽然壮族长期在历史上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并不对其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构成威胁,壮族与所在地区的其他民族的纷争并不多见。

从生态学的一般常识可知,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内,生态系统的物种间会存在竞争关系。各民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生态系统内部的一个个体因子。不同民族间当然也存在竞争关系,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土地,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民族间也常会发生矛盾与冲突,甚至爆发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当然,人口较多的民族无疑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在心理上不自觉地产生优越感。对弱小民族而言,大民族总会在心理、文化等层面对其产生一定的压迫感,这是产生民族矛盾与隔阂的常见因素。事实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壮